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及对策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夏杰长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 肖宇**

摘要: 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生力军,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不可替代的组成单元,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和创新创业的主要载体。但春节前夕爆发的这场肺炎疫情,给一直以来突飞猛进的中国经济增长按下了“暂停键”,大量的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到了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现金流的冲击、生产成本递增、用工难题显现、出口订单萎缩、线上模式冲击。为了全面对冲疫情对中小企业的潜在影响,从短期来看,需要做好金融支持、进行税费减免、做到依法防疫、推广远程办公、搞好出口扶持。从长期来看,政策出台的基本原则应该是避免“大水漫灌”影响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予出口企业全方位支持,避免中国制造脱离全球供应链,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等。

关键词: 疫情 新冠肺炎 中小企业 抗疫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63.3; R18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151(2020)03-0031-08

DOI:10.16110/j.cnki.issn2095-3151.2020.03.004

一、引言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但目前这场由武汉开始,继而借助春运的特殊节点蔓延到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截至目前,31个省(区、市)均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①疫情发生地湖北省武汉市更是从1月23日中午10:00开始关闭所有离汉通道,中国人民全员动员,开始了一场特殊的战“疫”。

从国际社会的反应来看,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月30日的评估中,将该疫情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随后宣布对中国实施入境管控措施,启动了包括撤侨和暂停中国护照持有人签证或入境、取消航班等措施。

而在中国国内,随着疫情的发展,延长春节假期、推迟大中小学开学、居家隔离、道路封

*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升级重大战略与政策研究”(No.2020CJYB003)。

** 肖宇为本文通讯作者。

①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和一般(IV级)四级。其中,I级响应属于最高级别的响应。

闭……诸多应对疫情的举措相继出台。为了全面遏制疫情的蔓延，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

可以预见的是，在全国动员基础上，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会充分发挥，歼灭疫情已只是时间问题。但作为突发事件，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效应不容忽视，尤其是承担了大量就业和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中小企业，它们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更弱，在此次疫情中，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二、中小企业的作用不容忽视

首先，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生力军。从所有制属性来看，大量的中小企业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充分昭示，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和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10月20日，习近平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的回信中写道，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党中央也多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落实鼓励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发展环境。根据公开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企业数量占到了中国企业总数的90%，中国税收的50%和GDP的60%来自于中小企业的贡献。^①在疫情防控的特殊关键时期，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开工延迟、订单萎缩、产品积压和现金流吃紧等现象正在蔓延，若不采取断然支持措施，将会加剧疫情过后经济增长的阻力。

其次，中小企业是吸收就业的重要渠道。站在历史的维度展望改革开放之路，一个成功的实践就是通过人员的自由流动，释放出了人口这一生产要素的巨大潜力。而在此过程中，大量的中小企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战场。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由国有向非国有）的进程中，中小企业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和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国有企业工人就业自由化的主要通道，也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长时间快速增长的关键所在。工信部中小企业局的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000万户，贡献了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②在此次疫情中，由于延迟开工和限制人员流动等措施，大量的中小企业陷入了现金流吃紧和经营困难的不利格局。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许多城市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关闭了部分非必要公共场所，暂停了某些行业营业，对外来流动人口实施严格控制，以致此前许多中小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者节后不能或不敢返程，造成了客观存在的“失业”现象。随着疫情防控时间的推移，这种可能的周期性失业给居民个人和整个经济带来的影响势必会逐渐显现，若不及时干预，收入的降低不仅会限制社会的消费水平，也会带来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最后，中小企业是创新创业的主要载体。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经济的奇迹，很大程度上即是建立在对创新孜孜不倦的追求。在党的十九大报

^① 《多名社科院专家把脉未来中国金融改革方向》，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8-09/28/c_1123499462.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信部中小企业局，<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527/index.html>。

告中,创新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在疫情发生初期,大量的中小科技创新企业,凭借自身在研发方面的巨大优势,迅速投入到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生产中去,如之江生物、捷诺生物、达安基因、华大基因等企业,为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在促进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引领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支撑。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战略的指引下,中小企业通过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企业家才能有机结合,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新企业创建和成长,还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真实产品 and 市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推动了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落地。

三、大量中小企业受到疫情冲击不可避免

一是现金流的冲击。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原本在春节期间火爆异常的餐饮、旅游、住宿、运输、教育培训、文艺演出、电影影视、体育场馆和家政服务等行业受到的直接冲击最大。以餐饮行业为例,受此次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一方面,顾客端来源严重缩水,大量居民较少外出,使得维持低客流运营的餐饮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如某餐饮行业连锁企业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公开表示,账上现金流只能支撑三个月。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餐饮行业的人员工资一直居高不下,在疫情防控期,门店租金和员工工资的支出,使得原本拥有“现金奶牛”之称的餐饮企业的现金流空前紧张。此外,火爆的电影春节档和旅游黄金周,也因疫情防控需要损失惨重。以影视行业为例,日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电视制片委员会和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停止影视剧拍摄工作的通知,要求所有影视制片公司、影视剧组及影视演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暂停影视剧拍摄工作。从影视行业的投资规律来看,打乱的拍摄计划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对于投资方来说,投资标的的回款周期被打乱,投资回报率折损,从而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现金流。此外,中小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的金融属性,在现金流受损的情况下,势必会引起资金供给方,如银行、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基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加剧企业的生存危机。

二是生产成本递增。其一是物流运输成本,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环节,新闻媒体报道显示,在疫情防控的早期阶段,部分省级之间的高速公路出于疫情防控需要进行了关闭,或者以人员排查的方式,增加了物流的运输时间。而在大量的农村地区甚至是市县区域,都进行了“封城封路”处理,^①从疫情防控的出发点来看固然无可厚非,封路减少了人员流动的频率,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但如此一来,导致大量人员和物资正常流动受阻,从而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企业的运输成本。其二是用工成本,此次疫情与春节假期的特殊节点叠加,根据我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在假期时间,企业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劳动者本人日工资或小时工资的200%支付工资报酬。出于本次疫情防控需要,春节假期延长了三天(1月31日、2月1日、2月2日),大量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集中在酒店餐饮、旅游、商超等部门,减少甚至断崖式下跌

^① 1月28日,公安部召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暨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明确提出:对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违法行为,要立即报告党委、政府,依法稳妥处置,维护正常交通秩序。

的客流和订单，与仍然需要支付的用工成本，包括基本工资和员工的五险一金等相叠加，在无形之中又造成了生产成本的递增。而就制造业中小企业来说，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部分地区执行了停工停产的“一刀切”措施，部分与防疫物资有关的中小企业，加班赶制防疫物资，在物流、原材料和用工成本递增的大背景下，生产成本的上升更是难以避免。

三是用工难题显现。从中国中小企业的行业构成来看，既有物流运输批发贸易、零售与服务行业（教育、孵化平台）、餐饮住宿娱乐文化旅游等服务行业，也有加工制造业、电商和软件、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更有建筑和农林牧副渔业等一、二次产业。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不少地方都出台了针对疫情发生地（湖北武汉）的人员排查和筛选工作，北京和广州等城市还发出了疫区人员暂缓返回劝告^①，而湖北作为人口和教育大省，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档写字楼里，湖北籍员工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关键的是，武汉九省通衢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人员输出大省，如四川、河南等地的务工人员，都必须经过湖北境内才能到达东南沿海的务工地区。截至2020年2月7日，武汉所有离汉通道，包括高铁、飞机和高速等都已关闭。人员流动的受限，直接导致了部分企业节后复工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整个供应链并引起连锁反应，部分中小企业可能难以承受此冲击而出现倒闭的情况。此外，大量社会学研究的成果表明，瘟疫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产生着重要影响。因为瘟疫本身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与压力，迫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条件模式以及行为做出一定的调整（唐魁玉和郑毅，2007），如人们更愿意追求生活品质而降低对物质条件的追求，更愿意选择离家近的地区进行工作，更愿意选择陪伴子女等，如此一来，则极容易对东南沿海的中小企业产生冲击。

四是外贸风险增加。其一，是外贸市场的拓展难度增加，虽然在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方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态度向有关各方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很多举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但是，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决定在国际社会引起剧烈反响，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2月5日的最新统计，在世卫组织不赞成甚至反对对中国采取旅行或贸易禁令的声明下，已有共计99个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入境管制措施，如暂停来自中国的人员入境、停飞往返中国航班、所有入境中国公民入境后隔离14天等。对外贸订单来说，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检验检疫措施将更加严厉，手续更加复杂，运输成本和非关税壁垒也将随之提升。其二，是外贸订单的违约风险增加，在推迟返工的背景下，大量生产企业前期外贸订单已无法按时完成，国际贸易订单交货延迟，企业可能面临海外客户取消订单，从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和应诉的法律风险。在生产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生产组织模式下，这种风险还有可能沿着企业生产链、供应链或担保链条进行横向的传递，外贸出口的上下游企业和航运、金融等都会被波及，尤其是位于“疫区”的湖北影响更甚，从而触发局部危机。

五是商业模式冲击。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虽然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重构已很普遍，但是

^① 2020年2月6日下午，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对疫情高发区计划返京人员，提前联系告知暂不返京，对已返京人员严格落实居家观察等措施。

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依托物理场所提供实体服务依然是其重要的行为习惯，如大量的中小餐饮企业、中小制造业企业、商场超市、教育培训、美容健身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及承担了大量灵活就业的个体工商户等。受疫情影响，“互联网+”势必会迎来一场新的爆发式增长，电子商务对线下服务业的冲击已不可避免。与此同时，远程办公、电子商务、数字政务、虚拟会务/商务、线上教学、网络直播等数字化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这种基于数字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商业模式，在各个领域的渗透将会加剧，传统的中小企业，必须尽快赶上这波数字化列车，进行传统模式的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否则在疫情过后，可能会面临更为严峻和长期的发展危机。

四、精准施策方能助力中小企业抗击疫情

一是做好金融支持。大量的餐饮住宿、交通运输、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影院剧院等服务业以及中小制造业企业和外贸企业受本次疫情影响最甚也最为直接，由于正常的生产经营被打乱，造成了收入的锐减，但房租和员工工资支出仍然不可避免，由此造成了大量中小企业现金流的紧张。因此，对中小企业给予金融支持至关重要。具体来说，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充分发挥好金融的杠杆作用，做好定向扶持，引导商业银行让利，给予中小微企业优惠贷款利率，同时对于疫情期间的到期贷款，给予期限宽限，采取降低利率、展期续贷、减免逾期利息等，疫情严重地区的企业和受本次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建议给予地方财政贴息贷款。政策性银行应该重点针对生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中小企业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湖北地区，给予低息或优惠专项贷款支持。同时，也要创新金融工具，简化审批流程，建立绿色通道，配置专项额度，充分利用短融、超短融等工具，给予企业必要的生产支持，引导风险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适当调整投资回报策略。引导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企业等地方金融机构根据客户企业受疫情影响实际，酌情增加贷款、租赁、保理额度。从长期来看，不断完善和丰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健全创业板体制机制，做大做强科创板，引导优质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和到资本市场融资，不断提升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

二是进行税费减免。受本次疫情影响，原本处于收入旺季的大量服务业企业订单锐减，大量制造业企业无法按时复工，对于体量规模小的中小企业来说，不变成本的支出无法避免，员工工资、五险一金、租金、偿还贷款和支付账款造成的压力无法避免，由此受到的冲击更为致命。因此，有必要对大量的生活性服务业，如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居民零售服务、居民出行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居民住房服务等行业进行税费减免。如对疫情防控关键期的一、二月进行相应的税收减免，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措施，同时，发挥我国的体制优势，国有企业要带头让利，对所属物业内的中小企业承租方进行房租和物业费用的减免，延期支付不收取滞纳金等。对于复工延迟企业和外贸企业，要允许其延期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对于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中小企业，按照上年度员工人数，给予一定的稳岗补贴。同时，也要创造更为优质的营商环境，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网上教育，多管齐下为企业减负。

三是做到依法防疫。在疫情防控初期，部分地区出于疫情防控需要都出台了地方的“土政策”，如封路、截留物资、公布疫情高发区返程人员个人信息等。这些“土方法”“土措施”，是

各地为了严防疫情扩散的临时举措。但是，封路造成了人员物资的正常流通受阻，截留物资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声誉，人为加剧了社会恐慌，公布疫情高发区返程居民的个人隐私又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甚至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歧视武汉人和湖北籍居民的做法，导致整个社会正常的人员和物资流动受阻，在极端情况下影响了疫情防控的宝贵时间，造成了整个社会运转效率的低下。在宏观层面，这不利于尽快恢复社会生产，从而加剧了大量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阻力。在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因此，扶持中小企业度过疫情危机的首要前提之一，就是在法制化的轨道上推进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好各单位、城市街道、乡镇村组的作用，断然不可“一刀切”，要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和各地实际，逐步有序开始恢复生产，为中小企业的复工生产保驾护航，对于触犯法律、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行为，如堵路造成的运输迟滞等行为，司法机关要加强执法力度，迅速执法，确保中小企业逐步恢复生产。

四是推广远程办公。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出于防控疫情需要，国家延长了春节法定假期，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推迟了上班时间，但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借助于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技术，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多年前只能到物理场所才能完成的服务和消费。典型的如线上教育、网上会展、电子银行、数字政务服务等多种业态。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瘟疫对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影响同样存在，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的是整个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尤其是在服务经济时代，大量的生产劳动只需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子终端，即可轻松完成在工业化初期必须在物理场所才能完成的生产活动。制造业同样如此，制造业的自动化、智能化发展，使生产车间的机器人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这在客观上，奠定了远程办公的社会基础。实际上，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全面来临，大量的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完全可以推广这一办公模式，如此一来，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还大大减轻了公共资源的消耗，节约了通勤时间成本，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指数。

五是重视消费作用。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重要马车之一，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本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假期，旅游酒店、住宿餐饮、影院、商超卖场、交通运输等行业损失惨重，被疫情“抑制”的服务业受到巨大的冲击（魏翔和夏杰长，2020），“黄金周”假期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未显现。在疫情防控结束后，全国各地各行业逐步恢复生产，居民消费时间的春节“黄金周”已然过去。众所周知，经济学中的消费，不仅指消费意愿，还有消费能力，受疫情影响降低的收入水准和受限的消费时间，都会拉低接下来全年的消费水平，从而降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在疫情逐步缓解之后，适时恢复五一“黄金周”，逐步落实弹性工作制，强制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以此来增加居民的消费时间，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还要适时逐步放开汽车等大件耐用消费品的限制，发挥好消费在刺激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六是搞好出口扶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自身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原料价格优势和广袤的国内市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从而走上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贸易强国之路。截至2018年12月，中国GDP已跃居全球第二并且多年稳居世界制造业出口国榜首，因此外贸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关键节点，当前的疫情事件给中国外贸增长蒙上了一层阴霾。有财经媒体甚至悲观地预言，美国的关税大棒没有做到的事情，疫情轻

易地做到了。因为，WHO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后，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边境封锁措施，主要手段有撤侨、缩减甚至取消航班、加强中国游客入境审查、限制签证和限制旅行等。随着疫情的发展，中国企业复工延迟，导致前期的订单可能无法按时交付。突然增加的检验检疫限制措施，使得中国出口产品更为艰难。考虑到外贸的重要作用和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局势，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是要在尽快有序恢复全国生产的基础上，对中小出口企业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措施。具体为，充分发挥出口融资的杠杆作用，做好金融支持。商务部门要积极对接辖区出口中小企业，简化不可抗力证明出具流程，组建外贸企业法律服务团积极应对疫情形势下国际贸易纠纷等。

五、中小企业扶持措施的长效机制探讨

首先，是要避免大水漫灌的“一刀切”式救助，扶持政策的评价标准，应该是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为基准。虽然在此次疫情中，大量的中小企业都受到了冲击，一些企业也遭遇了生存危机，但经济政策的出台，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要秉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因为，与事实存在并且占据一定比例的社会弱势群体相比，企业家群体的个人财富积累、知识学识储备和资源整合能力，都远高于普通老百姓，应对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高。如若不加区分，政府人为地“大水漫灌”扶持，势必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从整个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可能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认为突发事件对于企业经营来说，也是正常的经营风险，如何应对考验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制度设计和企业家才能。因此，一定要避免出现大规模、无原则、无底线的扶持浪潮，政策设计应该更精细化和差异化，大规模的扶持刺激，只会迟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发挥，不利于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政府扶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维持经济增长、确保就业、维持社会稳定等多维目标的动态平衡。例如，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餐饮、住宿、商超、客运等行业，应该以保就业、保民生为导向，如鼓励辖区商业银行提供信贷支持；对于初创期的企业，应该通过场地租金、税费减免和一定程度的返还以及员工“五险一金”的缓交等为主；对于直接生产抗疫物资，如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消毒液和特种医疗设备、特种急救车等疫情期间迫切需要的制造业企业，扶持政策应该侧重于恢复生产并为生产提供便利，提供扩大产能的专项低息贷款和短融、超短融债券等。

其次，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中的积极作用，以此为契机，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的畅通与否，与企业生存息息相关。突发事件，是企业日常经营中所面临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为了应对这类经营风险，金融体系中孕育而生了保险、期货等多种对冲风险的金融工具。但是，中国长期以来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制，大大迟滞了中国金融业整体竞争能力的提升。在当前的中国融资体制下，有无固定资产抵押贷款、企业的所有制属性成为了能否成功在融资市场融资以及融资速度和融资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甚至加剧了资金的空转和体内循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借助此次疫情，应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鼓励保险公司开发相关金融产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如喻平和豆俊霞（2020）就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且对非国有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更为明显。同时，要鼓励创业投资机

构的发展壮大，优化丰富中国金融体系产品矩阵。应用市场化的方法，应对潜在的经营风险。这不仅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促进中小企业长期健康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再次，扶持政策应该更多关注疫情对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要在国际规制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对出口制造企业的全方位定点帮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当今世界市场，分工使得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一个重要影响之一，就在于通过四十余年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但中国出口中包含了大量他国（或地区）转移价值，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价值链中还处于较不利地位（肖宇等，2019），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程度界定以及受疫情防控需要，大量国家对中国人员和物资出入境实施的临时性限制措施，都势必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在中国人力资本提升和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的大背景下，世界产业链的转移和发展趋势以及订单及市场的可能流失，才是出口企业未来真正需要应对的切实风险。因此，对于这类零部件出口企业，一定要加强政策方面的全方位支持，从财政税收，到出口信贷、出口保险等方面给予真金白银的扶持，确保其不因疫情的影响而脱离全球产业链。

最后，要抓住疫情过后社会发展趋势变革的机会，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步伐，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下，内需和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此次疫情中，影响最直接的恰好是服务业和内需。但是，正所谓“危中有机”，受疫情影响，中国的线上教育、电子商务及依托数字平台进行的生产和服务产品的交付及使用，正在成为新的投资风口。虽然数字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普遍，大量的“数字+”“互联网+”不断涌现，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如何拥抱数字化发展的时代机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AI等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效能，可能正在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事关企业是否能够适应时代变革导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政策的设计，应该是顺应社会发展导向，并出台有力的政策引导社会导向的发展。因此，抓住数字化的发展机遇，鼓励支持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不断提升其应对危机，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能力，应该是本次政策扶持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

- [1] 唐魁玉、郑毅 《瘟疫环境下个体生活条件模式与行为的理性化——以 20 世纪初哈尔滨的瘟疫事件为例》，载于《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 年第 4 期，第 52~54 页。
- [2] 魏翔、夏杰长 《减损失降成本助中小企业渡难关》，载于《经济日报》2020 年 2 月 9 日。
- [3] 肖宇、夏杰长、倪红福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载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 年第 11 期，第 40~59 页。
- [4] 喻平、豆俊霞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载于《财会月刊》2020 年第 2 期，第 1~7 页。

（责任编辑：宋艳波）